

人·文·视·窗

该书是
中央电视台
“实话实说”
节目总策划人
杨东平先生
对中国教育、
生态和城市文化的
“实话实说”。

杨东平 著
天津人民出版社

倾斜的 金字塔



倾斜的金字塔

杨东平 著

天津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倾斜的金字塔/杨东平著. —天津: 天津人民出版社,
2002. 1

(人文视窗丛书)

ISBN 7-201-03948-2

I. 倾... II. 杨... III. 社会科学-文集
IV. C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1) 第079792号

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

出版人: 赵明东

(天津市张自忠路189号 邮政编码 300020)

邮购部电话: 27314360

网址: <http://www.tjrm.com.cn>

电子信箱: tjrmchbs@public.tpt.tj.cn

河北海顺印业包装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

2002年1月第1版 2002年1月第1次印刷

850X1168毫米 32开本 7.75印张 2插页

字数: 170千字 印数: 1-5,000

定价: 15.00元

目 录

教育时评

千年教育:文明之火的照耀	(3)
百年回首:中国教育现代化 之梦	(8)
重温大学精神	(18)
透视“韩寒现象”	(28)
走进学习化社会	(31)
高等教育大众化:一个新的时代··	(36)
大楼与大师	(45)
大学之道:精神重建与制度创新··	(49)
中国高等教育的苏联模式	(60)
革命与传统:毛泽东的教育遗产··	(70)
中国近现代大学的教育目标	(82)
恢复教育的人文性、民主性和 公正性	(96)

城市空间

绿色文明在中国	(107)
遥看新世纪的绿色	(115)
中国人的汽车梦	(119)
阿炳、李鸿章、周作人	(124)
建筑是一种文化	(127)
《实话实说》:营造家的感觉	(130)
工业文明在中国	(133)
遐想“新住宅”	(136)
我国的摩天大楼热应当刹车 ···	(141)
也谈“八大胡同”的旅游开发 ···	(144)

谁来保卫文化的北京 (147)

对我国城市建筑的文化阅读: ... (156)

心路历程

四种人 (173)

女人和钢琴 (176)

还有爱情吗? (179)

遍地贵族 (182)

《三国》的文化 (187)

网上硝烟 (190)

首先是公开 (193)

重游黄山记 (196)

从红到绿 (200)

后记:参与和超越 (241)

教育时评

千年教育：文明之火的照耀

公元 1000 年，是中国宋朝的咸平三年。那一年的科举破了纪录，共录取进士 409 人，诸科 1129 人，总计多达 1638 人。发达的科举制，造就着重教兴学的社会风气。在乡间的村学、义学或私塾中，儿童们摇头晃脑地背诵着“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成为流传千年的启蒙课本。遍布大江南北的书院和理学的兴盛，使官学之外私学的传统得以发扬光大。1180 年，朱熹重修白鹿洞书院，邀请陆九渊前来讲授“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一章，并将讲义刻于院门石碑之上。朱熹加注刊刻的《大学》、《中庸》、《论语》、《孟子》，成为儒生的基本教材。东亚国家在儒家文化的教化之中，越南、高丽也在科举取士，遍修文庙，塑孔子、周公像。

中世纪的欧洲，教堂的钟声和骑士的马蹄声交织。在教会管理的教区学校、唱诗学校、经院学校中，师生们虔诚地诵经、祷告，教育被视为是一种自我拯救的途径。1096 年，第一次十字军东征之后，在宫廷、贵族及武士家庭中流行着骑士教育。骑马、游泳、投枪、击剑、行猎、下棋、吟诗成为“骑士七艺”。1128 年，西欧出现由商人和手工业者行会主办的基尔特学校，它们后来发展成为教会之外由城市政府管理的城市学校，注重读写和计算，并可以不用拉丁语，而用本国语教学。

意大利的萨莱诺大学(1131 年建立)、博洛尼亚大学(1158

年)、法国的巴黎大学(1150年)等等,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大学。那时的大学没有图书馆、实验室和教室,教师在学生的住处、公共场所及街道旁讲学,如古希腊的智者那样。由于课本主要靠手抄,大学教师是惟一有书的人,争论和答辩于是成为最主要的教学方式并流传至今。在与教会持续的较量中,大学逐渐取得某种独立性和自治权,对教师资格的认可最终由教会转移到大学。被教师行会接受的人被称为硕士、博士或教授,处于学徒等级的年青的新手称为学士。大学开始设立自己的标准,世俗的权威逐渐占据统治地位,一个自由的、争论的、科学的世界逐渐呈现。

文艺复兴的时代来到了。源自古希腊的“身心既善且美”、和谐发展的教育理想在欧洲重新复活。新教育的目标不再是培养神父和僧侣,而是如拉伯雷所说的“巨人”——高贵善良、能文能武、多才多艺的“全能的人”。1423年,维多里诺在意大利开办了一所名为“欢乐之家”的贵族学校,成为人文主义教育的早期实践。儿童和教师在朋友般的亲密气氛中学习和生活。学生以学习古典语文为中心,同时学习数学、天文、历史和自然科学,以及音乐、舞蹈、骑马、射箭、游泳和开展各种游戏。

当意大利文艺复兴开始的时候,中国建立了明王朝。1375年,明太祖朱元璋下令全国普遍设立社学,为封建时代第一次提出普及教育的主张。1393年,最高学府国子监的学生总数达到了8124人。王守仁、湛若水等在书院的讲学,使儒学发展为心性之学。科举制病态毕露,科场案迭起。1645年河南乡试,一考生将“皇叔父”写成“王叔父”,主考官被押到刑部治罪,为清代文字狱之始。

商业社会的出现和科学进步加速了文化变迁。培根写下了

“知识就是力量”的名句。1705年,牛顿被女王封为爵士,安娜女王和王子特地步行到剑桥大学参加授爵仪式典礼,以示重视。捷克教育家夸美纽斯撰写的《大教学论》,称教育为“把一切事物教给一切人的全部艺术”。18世纪中期,全欧洲最有影响的教育书籍是卢梭的《爱弥尔》和加乐太的《论国民教育》。卢梭提出“自然教育”的主张,认为应当使儿童置于教育过程的中心,从而打开了囚禁儿童身心的大门。1774年,德国的巴士多举办了一所新型的“泛爱学校”,它又被称为“一视同仁”学校,所收儿童不分贫富,不论宗教派别。在新大陆,1642年清教徒的《马萨诸塞州教育法》是世界上最早的义务教育法。

18世纪,多数欧洲国家均完成了国家接管教育的过程,为低层平民举办的国民教育开始兴起。在美国向西部拓荒的路程上,留下了一处处学校和教堂。普及教育成为深入人心的民主主义理念,并发展为公立学校制度。杰佛逊相信:“自由若不掌握在人民手中,尤其是受过一定教育的人民手中,它就永远不可能得到保证。”大工业时代的学校教育在19世纪宣告完成。德国教育家赫尔巴特的理论,使“学科中心、教师中心、课堂中心”成为学校教育新的金科玉律。1837年,福禄培尔在德国开办了世界上第一所幼儿园。洪堡在柏林大学的改革,确立了学术自由的准则,科学教育开始与人文教育并驾齐驱。

已经落在世界强国之后的中华帝国,开始了向西方学习的过程。1862年,培养翻译人才的京师同文馆正式开学,开中国近代学校之先河。在沿海城市和开放口岸,出现了外语学堂、武备学堂、教会学校等一批新型学校。1872年,容闳率第一批留美幼童詹天佑等30人赴美留学,启动了至今澎湃不息的留学潮。1881年,因担心留学生的“西化”,清廷决定全部撤回留美

学生,马克·吐温等美国文化界人士联名写信给清政府挽留未果。“留学救国”、“教育救国”成为许多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的选择。

中国进入 20 世纪的标志性事件是教育变革。1903 年颁发的《奏定学堂章程》(癸卯学制),成为中国第一个现代学制。1905 年,清廷宣布废止实行了 1300 余年的科举制,遍设学堂,广开民智。洋学堂里,孩子们上午“子曰诗云”、下午“声光电化”,唱着“长亭外,古道边”的新歌。蔡元培在北京大学的改革,奠定了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风气。1920 年,北京大学首次接受邓兰春、王兰等九名女生入校旁听,开始了男女同校的历史。

20 世纪初,世界范围内的进步主义教育运动,宏观地改变了 19 世纪形成的学校面貌,杜威“儿童中心”的理论,使儿童成为教育世界为之转动的小太阳。1918 年,美国改革中等教育,实行“为生活作准备的教育”。中学教育新的“七项基本原则”是:健康,公民的权利和义务,有价值地利用闲暇时间,有效的家庭成员,基本学习过程的掌握,合乎道德的品质,职业训练。杜威的学生陶行知在南京开办的晓庄学校,提倡“生活即教育”,实行手脑结合、教学做合一,进行了现代教育的尝试。

斯大林时代的苏联,彻底否定了 20 年代杜威的巨大影响,建立了高度集权、计划统一的教育体制。苏联的教育官员自豪地声称,可以确切地知道全苏联每一个教室现在在上哪一课。法西斯主义教育形成一股逆流。1933 年,德国教育部长称“种族、武器、元首和宗教”为其教育纲领的基本概念。狂热的军国主义教育和战争机器,把日本的学校变成了军营和兵工厂,大批青年学生成为炮灰。

战后独立的新兴国家,无不将教育作为民族振兴的重要工

具。印度的民族教育运动和甘地所鼓吹的“以手工劳动为中心”的教育思想,与毛泽东的教育价值有异曲同工之妙。中国按照苏联模式大规模地改造和重建教育。凯洛夫取代了杜威,俄语取代了英语,“专家”取代了“通才”。由于1957年苏联的人造卫星上天,冷战格局下世界各国的教育竞争加剧。

60年代世界性的学生造反突显了严重的教育危机。红卫兵运动、“文化大革命”造成中国教育的中断和荒废。美国以反战和民权运动为背景的青年学生运动发展为“嬉皮士”的狂欢。1968年法国的“五月风暴”导致了戴高乐政府的下台和深刻的教育改革。世界范围的教育改革风起云涌,“学会生存”、“终身教育”成为新的教育理念。超越了“象牙塔”的现代大学成为社会进步的“加速器”和“世俗的教会”。

1977年,中国重新实行高校招生考试,恢复了“分数面前人人平等”。学校教育重新回到了五六十年代。考试中心、分数至上的陈旧传统的复活,演变成“应试教育”的严重弊端。千百万学生在死记硬背和题海大战中苦度青春。星期天,城市中游动着哈欠连天的琴童、画童大军。1988年,一个叫苏明娟的农村女孩渴望的目光打动了中国人的心,200多万贫困儿童因“希望工程”捡回了希望。1998年,中国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仅占GNP的2.55%。1999年,中国普通高校招生总数达153万人。“教育现代化”成为激动人心的目标,引导我们在新世纪的前进。

1999年12月

百年回首：中国教育现代化之梦

中国现代教育的生长，始于清末新政时废科举、设学堂，以1904年建立第一个现代学制“癸卯学制”为标志，至今尚不足百年。中国教育的面貌在20世纪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尽管上半叶和下半叶，时代背景、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大不相同，但教育现代化的脉络依然相连，其所面临的基本挑战和基本问题也大致相似。

诚如一位教育家所言：现代教育变革的资源主要有三，一是本民族的文化传统；一是外来的教育文化；一是自身的教育实验和改革实践。从这么三个层面回顾20世纪中国教育现代化的历程，的确是简明清晰的，而且发人深省。

由于现代教育——当时称为新学或新教育——本身是对陈旧传统背离和反叛的产物；因而，对封建文化传统的批判改造成现代教育的出发点和基本任务。五四新文化对于反对旧的教育、文学、文化传统有摧枯拉朽之功，主张“打倒孔家店”，这种今天看来十分激进的态度，无疑是具有历史合理性的。在20世纪的大多数时间里，教育的革新者都对传统教育保持很高的警惕，持强烈的批判态度。但是，一个漫长古老的传统并不可能被轻易打倒、置换。传统教育在新的社会形态中的实际状况是另一回事。一方面，官方意识形态强调“中体西用”，事实上，“体用之争”贯穿了整个20世纪。知识界对文化传统也有从激进反叛到

保守的不同态度;但即便被归为文化保守主义的梁漱溟等人也主张变革旧传统,只不过他们觉得这种改变应适应中国的现状和中国文化的形态。另一方面,在新旧交替的过程中,新式教育的影响始终限于沿海地区和大城市,在广大农村和内地,教育的面貌仍然是比较传统的。虽然儒家文化的至尊地位不存,但儒教社会尊重知识、崇尚知识分子的传统氛围尚未改变;源远流长的民间办学、私人办学的传统依然强劲,民间教育生长的空间依然存在。

值得认识的是,伴随着改变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传统教育的命运发生了出人意外的逆转。上半叶从西方传入的“新教育”在新的意识形态中又成为“旧教育”,在五六十年代遭到强烈的批判和否定。毛泽东以不妥协的姿态激烈批判中国科举教育的遗留和杜威、胡适等的教育影响,以及建国后 17 年的教育路线——称之为“封资修”的糟粕,发动了一场场主张与传统“彻底决裂”的“教育革命”和“文化革命”。

随着对文革的否定和恢复中断了十年之久的高考制度,被长期压抑的全民族的教育热情迅速化为考试主义、学历主义的强大动力,使基础教育重新被纳入升学教育的狭窄轨道,最终形成了一种以考试为中心、为考试而进行的教育,在 80 年代被称为“片追”(片面追求升学率),90 年代被恰当地命名为“应试教育”。在将近 20 年的时间里,对封建传统教育的批判和清理几乎销声匿迹。可以说,“应试教育”的出现是传统教育在当代的复活和强化。当代教育虽然在规模和能力上获得巨大的发展,但学校教育“死读书、读死书”的现实和极端工具主义、功利主义的精神氛围,似乎退回到相当传统的状态。与此同时,在旷日持久的对传统的“大批判”中,社会文化中的传统资源已经严重流

失,青年一代对其日益淡漠和隔膜,甚至缺乏必要的了解和尊重。学在民间、社会办学的教育传统也消失已久,90年代才重新艰难地恢复。在新的世纪之交,我们不得不扪心自问:当我们抱着破旧立新、推陈出新的愿望去批判、改造传统时,我们摒弃和继承的究竟是精华还是糟粕?在民族文化传统资源迅速流失和世界一体化进程加速的大背景下,我们和自身的教育文化传统究竟应当建立一种什么样的关系?重新理性地梳理我们的文化之根,滋养青年一代对民族文化尊重的态度和亲近的感情,并通过对传统的“创造性转化”使之成为教育现代化可以凭借的资源,依然是面向新世纪的教育必须面对的难题。

在社会现代化的过程中,仿效先现代化国家的社会制度、教育制度,是后发展国家的共同道路。20世纪中国教育现代化的历程,也是不断学习、引进外来文化,中西文化强烈冲突、碰撞、融合的痛苦过程。这大致是上半叶学习引进日本、美国教育模式;下半叶移植苏联模式的历史。而80年代以来的改革开放,在体制改革层面的基本努力,可以说就是走出苏联模式。

由于近代中国险恶的生存环境、救亡图存的现实压力,晚清时从政府到社会,对发展新学具有急切的态度和强烈的国家功利主义价值。政府优先发展培养专才的高等教育而非普及基础教育;在高等教育中优先发展具有急效的船舶、铁路、军事等工程技术学科。中国第一批近代大学基本是从洋务运动时期培养实用人才的外语学堂、武备学堂发展而来的。20世纪初以学习日本为主的原因之一是“去华较近”、“易晓畏繁”、“易仿行”,而留日学生又多为速成科,以图速效。出于深刻的文化焦虑,世纪初的文化启蒙呈现“饥不择食”的急切,各种学说、思潮、运动纷来沓至、各领风骚没几时,在教育领域同样如此。五四之后,美

国教育的影响日增,杜威的进步主义教育运动深刻地影响了中国教育。突出的表现是1922年,由教育家组织制定的新学制(壬戌学制),一反民初仿日学制,采用美国“6-3-3-4”单轨制学制(小学六年、初中高中各三年、大学四年)。新学制的“七项标准”(适应社会进化之需要;发挥平民教育精神;谋个性之发展;注意国民经济力;注意生活教育;使教育易于普及;多留地方伸缩余地),杜威思想显而易见。此后,梅贻琦在清华大学、蒋梦麟继蔡元培之后在北京大学,按照美国大学模式进行的建设改造,取得了显著的成效。

但早在三四十年代,对新教育“食洋不化”的批评就一直存在,比旧式教育更为昂贵的新式教育,增加了普及教育的困难,城乡之间的教育差距进一步扩大。不少接受新式教育的才子仍热衷于舞文弄墨,学校教育的内在精神、价值尚未更新,它被面向民众的教育家陶行知激烈抨击为是培养小姐、少爷、“高级废物”的教育。在源自西方的制度化的新教育逐渐扩大的同时,活跃一时的平民教育、乡村教育运动,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对西学资源的本土化、中国教育的民族化所作出的可贵探索。

新中国成立之初,尽管《共同纲领》提出了“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民主主义的文化纲领;但在当时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按照苏联模式重建社会制度和教育制度,采取了“一边倒”的态度。50年代对一种外来文化移植、复制的彻底性,也许是十分罕见的,为研究后发展国家的现代化模式提供了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案例。80年代的第二次西学东渐,教育界重新传播西方思想学术,虽然也重温了从夸美纽斯到杜威的西方经典,传入了赞可夫、布鲁姆等当代国外的教育文化,但在精神的深度和传播的广度上与五四时期的文化启蒙、与50年代凯洛夫教育学的

风靡全国都不可同日而语。在学校教育中真正取得实效的,似乎偏于工具性、技术性的方面,典型如标准化考试,电化教学等。它与教育自身人文传统逐渐式微、工具理性日益扩张的过程是相吻合的。时至今日,中国面向世界、与世界主流文明的“接轨”,在很大程度上依然意味着摆脱高度集权、具有浓重技术主义色彩的“苏联模式”的束缚。我们虽然提出了“中国特色”的要求,但它的内涵和目标却仍待充实和廓清。如何恰当地处置自身的文化传统和外来的教育文化,今天仍然是令人困惑的问题。它所反映的,其实是一种更为基本的文化困境:五四时期就曾提出的文化重建——建设民族的新文化——的任务,至今尚未真正实现,仍需我们在新世纪的努力。

每一个时期的教育,都建立在此前教育变革的基础之上,需确立对“前朝遗产”、“晚近传统”继承或扬弃、改造的不同态度。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本国的教育改革的实践,也成为新的变革的重要资源。

1949年12月,新中国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提出建设新教育的方针是“以老解放区教育经验为基础,吸收旧教育某些有用的经验,特别要借助于苏联教育建设的先进经验”,^①很鲜明地指出了新中国教育的三个来源。虽然此后实际的教育发展,并没有完全按照这个方针执行。1957年6月,周恩来在《政府工作报告》中称,过去教育改革中发生过若干偏差,“主要是否定了旧教育的某些合理部分,对解放区的教育经验没有作出系统的总结,加以继承,并且在学习苏联经验的时候同我国的实际

^①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大事记(1949~1982)》,第167、177页,教育科学出版社。